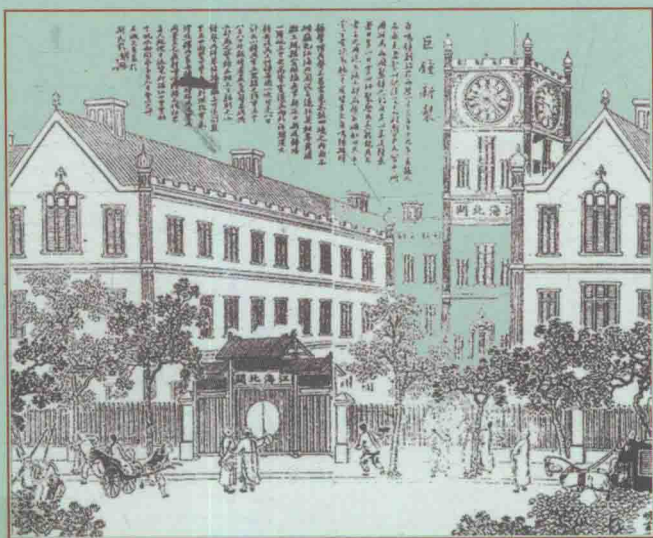


晚清以降： 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

苏生文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晚清以降： 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

苏生文 著

 商务印书馆
81 *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苏生文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4031-7

I. ①晚… II. ①苏…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
中国—近代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603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

苏生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031-7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42.00 元

目 录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清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以“小莽苍苍斋”所见学者为考察中心	3
港埠外向与沪津汉城市重心的转移	22
中国近代水运中的帆、轮消长	33
近代交通工具与“男女之大防”的突破	49
铁路与近代旅游	63
交通近代化与公共秩序	78

走向世界与认识世界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	101
走向世界的航路	105
明清来华西方人吃什么?	143
近代国人对西方饮食文化的认识	153
木头与石头	
——近人对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认识	177

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

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	201
1877 年的火车	227
唐胥铁路：“马拉火车”的奇观	240
“铁轨纵横于西苑”	249
晚清福建的轮船业和轮船商	258

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明

“自由大可结婚姻”

——晚清婚姻自主的言论和实践	271
《新石头记》里的“现代文明”	281
从竹枝词看西方物质文明在中国的传播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292

大变动时代的历史人物

咸丰帝“避战求和”质疑	311
慈禧太后的“本能”	321
“春帆楼下晚涛急”	
——甲午前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外交策略之比较	333
“老来失计亲豺虎”	
——李鸿章、《中俄密约》与中东铁路	373

陈璧与中国铁路	390
晚清摄影人闻知录	414
后记	446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清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以“小莽苍苍斋”所见学者为考察中心

晚清学术（1840—1911）是清中前期学术的自然传承和延续，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在此期间，学者们秉承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版本、史学、边疆史地等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然而，晚清学术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学者改变了乾嘉时期那种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经学的老路，开始面向现实、关心政治。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是“今文”还是“古文”，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于经世致用。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则趋向于“中体西用”——即在“原则”问题上遵循捍卫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实际问题上则吸收西方的长处。当然，也有个别“出乎其类”的学者，如郭嵩焘等则认为西方的文教制度也多有可学之处，但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响，使晚清学术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康有为等今文学派学者“巧妙”地将今文学说中的某些观点加以提炼和改造，使之变成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将之运用于实践。甚至那些在学术上与今文学对立

的古文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维新变法。

庚子之变后，革命学说兴起，作为封建专制制度思想基础的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一些学者在回归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普通一家的本来地位、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的普通学者身份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对清末以至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旧”学后劲

盛行于清盛期的汉学考据学发展到晚清，虽势头有所减弱，但依然人才济济、著述丰富。被章太炎称为“天下耆硕惟兹一个”（《致“国粹学报”馆书札》）的孙诒让，研究门径完全传承乾嘉训诂考据，尤其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诸家之学，走的是正统的考据学（朴学）的道路。他的一生，著作多达三十五种，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计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经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斟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庠述林》等。未完稿的还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其中积二十余年之功著成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研究周礼的最精审详备之作，把《周礼》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的另一名著《墨子间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

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则是研究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开创了利用甲骨文这一新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先河。孙诒让在考据学上的研究成果与他的前辈相比，毫不逊色。

另一位“能为正统派张大其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章太炎，治学门径也是继承乾嘉汉学风格。其主要精力放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研究方面，从校订经书扩大到校订史籍和诸子诸书，从解释经文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章律和典章制度等。主要学术著作有《诂书》《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韵语》《文始》《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

此外，王先谦、李慈铭、杨守敬和陈澧等学者，也以考据见长。

王先谦“治经循乾嘉遗轨，重考证”^①，著有《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补》《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元史拾补》《史记旁证》《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等，汇编刊刻了《东华录》《东华续录》《续皇清经解》等。其中《续皇清经解》为阮元刊刻的《皇清经解》的续集，使“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②。

李慈铭深受汉学考据影响，在治史方面承乾嘉遗风，精于训诂，通释假借，旁征博引，细入毫芒，以精博而著称于世。经李慈铭校勘、考证的史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等

①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707页。

②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46页。

十一种，其中以《汉书》的校勘最为精湛，为史籍考据的经典之作。此外，还著有《唐代官制杂钞》《宋代官制杂钞》《元代重儒考》《明谥法考》《南渡事略》《历代史乘》《闰史》《后汉书集解》等十余种，是继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之后的又一家。

杨守敬用考据方法，著《禹贡本义》《古地理志辑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疏》等史地类著作多种。

陈澧宗汉学，以训诂考据为门径，精于天文、地理、乐律、音韵、律历、算学、文字等，有《说文声表》《切韵考》《声律通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水经注提纲》《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东塾集》《弧三角平视法》等传世。

桐城派自“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鼎）之后，经“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和姚莹）的传承，势力虽有所削弱，但到了晚清之际，在新掌门人曾国藩的努力下，重振旗鼓，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后，“曾门四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和薛福成传承了该派的衣钵。其中，被称为“桐城后殿”的吴汝纶，甚至把“辞章”提高到“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吴汝纶《答严几道》）的地位。而这种“宁失真，不伤洁”的思想，对他的弟子、翻译家严复有着直接的影响。后者以桐城古文笔法译述西方名著，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中的“信、达、雅”三大准则，被后来的翻译家奉为圭臬。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在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及研究者陈介祺、缪荃孙、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传承诸前辈（阮元、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程瑶田等）的金石爱好和借助于金石材料研

究学术的方法，在金石学上多有创获。

以收藏毛公鼎而著称、与潘祖荫并称为“南潘北陈”的陈介祺嗜好收藏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七千余方，特建“万印楼”藏之，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簠斋印章》。此外还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藏古目》《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等。

缪荃孙也是位收藏家，曾将自己收藏并考证研究的一万八千余种金石拓片编成《艺风堂收藏金石目》。后又在这本目录的基础上，编撰了《江苏金石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使金石学这一传统门类拓展了研究对象。孙诒让 1904 年著成的《契文举例》，成为甲骨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罗振玉也从 1906 年起收集甲骨近两万片，并断定甲骨是殷商遗物，辑得《铁云藏龟之余》，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陆续编订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王国维在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的过程中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甲骨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商周时期的礼制和地理等，将甲骨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在传统的地理学方面，李文田、屠寄、杨守敬、王国维等人，传承前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在边疆史地研究上颇有建树。

李文田是著名的辽金元史专家，谙熟三朝史地，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等。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亲自深入北地寻碑访刻、考察地理，写下了“左临虎北右飞狐，迢迢长城古画图。绝塞关山秦上谷，极天岚采汉军都。明昌故苑生禾黍，统漠荒台长桦

榆。斜日牧童忘旧事，尚从沙碛觅沈庐”（《行书七言律诗轴》）的壮丽诗篇。

屠寄长于蒙古史研究，用二十多年时间编撰成蒙古史巨著《蒙兀儿史记》。该书广采中外文资料对《元史》进行校补，纠正了《元史》中的许多讹误，并搜集零星史料，补充了《元史》所缺的数百个人物传记，弥补了《元史》对元朝建立前的早期蒙古族史、四大汗国史以及许多重要历史人物记载的缺略，以双行夹注形式对蒙元史的史实、年月、人物、世系、官爵、地理、部族等作了大量考释，见解精辟。他的其他著作还有《黑龙江輿地图》《黑龙江輿图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等。

杨守敬在《水经注》研究、历代地图绘制以及《地理志》校补等方面颇有成就。他与弟子熊会贞合作完成的《水经注疏》，对《水经注》一书征引的故实均注明出典，对所论述的水道逐一详其源流，并对清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大家的校释进行订正，被视为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的集大成者。杨守敬的另一著作《历代輿地图》，以一朝或一国为一组，绘录了从《左传》《战国策》《汉书》至《明史》的各《地理志》中的绝大多数地名和山川形势。《历代輿地图》以《大清一统輿图》为底图，以朱墨套印、古今对照、大比例尺等方式制成，其详细精确程度超过以往，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国维则在先秦时期的部族名称和部族迁移、国家地域、都城，以及秦汉郡的变迁、辽金元时期的边疆部族及其文献等方面，都有精到的研究。

二、“通经致用”

然而，学术往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着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学者改变了乾嘉时期那种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经学的老路，开始面向现实、关心政治。

率先走出书斋的是今文学者。他们借用今文经学便于附会、发明己意的特点，积极从今文经典中寻求变革的“微言大义”，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解释或比附，为我所用，以达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语）的目的。

段玉裁外孙龚自珍从28岁时起追随今文学者刘逢禄治《公羊春秋》，皈依了今文学，著有《春秋决事比》《大誓答问》《左氏决疣》《五经大义终始论》《古史钩沉论》《壬癸之际胎观》《尊隐》等今文学著作。他治学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而是借用今文经学来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给当时沉闷的学术思想界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龚自珍是晚清思想解放的第一人，“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今文经学直接孕育了光绪年间的一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龚自珍不仅使康梁等人产生了对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怀疑和动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上是龚自珍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因此，龚自珍被认为是“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

魏源也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主今文经学。他的重要的今文学著作《诗古微》，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失传已久的西汉今文经学派鲁、韩、齐三家所据的《诗经》文本及其论说组织为一个系统，用以攻击古文经学所推崇的《毛诗》；另一著作《书古微》，则意在阐明西汉《尚书》今古文的微言大义，对东汉马、郑的古文学说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同龚自珍一样，魏源的治学目的也是借今文经学昌言变革、谋求经世。他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纂了旨在“备臆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晚清经世思想的开启者。

继龚、魏之后，宗奉今文学的学者有戴望、王闿运等人。王闿运又将薪火传给了弟子廖平。廖平又影响了康有为。而康有为在牵强附会、发明己意为政治斗争服务这一点上，则远远地超过了前者。

康有为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把《公羊》的“三世”和《礼运》的“大同”“小康”糅合起来，在戊戌变法前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将《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认为今日中国已是“小康”，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这种依据儒家今文学说而推演出的、由“乱世”到“小康”、由“升平”到“太平”的庸俗进化论，是达尔文学说尚未输入中国前的一大“发明”，为维新变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将之运用于实际（百日维新）。

宋学（理学）讲究义理、注重内修，在明末清初曾因“空疏”而大受谴责。但是，在汉学占主导地位的盛清时期，仍有

一股宋学潜流贯穿始终，从未间断。从清初的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到乾嘉时期的桐城派，都在捍卫着宋学在儒学中的道统地位。这一派学者强调“明体达用”，即先专心致力于“为己之学”，进而推己及人，贡献于国家、社会，通过经世而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他们认为，学问与事功不应该分离，作为一名学者，治学为其所当为，事功亦为其所当为，都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晚清最著名的宋学家曾国藩正是在他的老师唐鉴的启发下，在前贤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这“儒学四门”的基础上，适应时势的变化，明确地将“儒学四门”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的，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从而为“经济之学”找到了相对应的正统地位。由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建立了“不世之功”，不仅实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所孜孜以求的“修齐治平”的理想，而且在宋学和经世之学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在晚清，经世致用不仅是今文家和宋学家的专利，而且也是许多古文家的追求。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原先“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古文家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他们的治学旨趣也从“求真”转向“致用”（“通经致用”“通大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孙诒让和章太炎。

孙诒让本来是一心沉迷于考据的古文家。在甲午战争的刺